

張劍 張燕翼 整理

黃子雲全集

第十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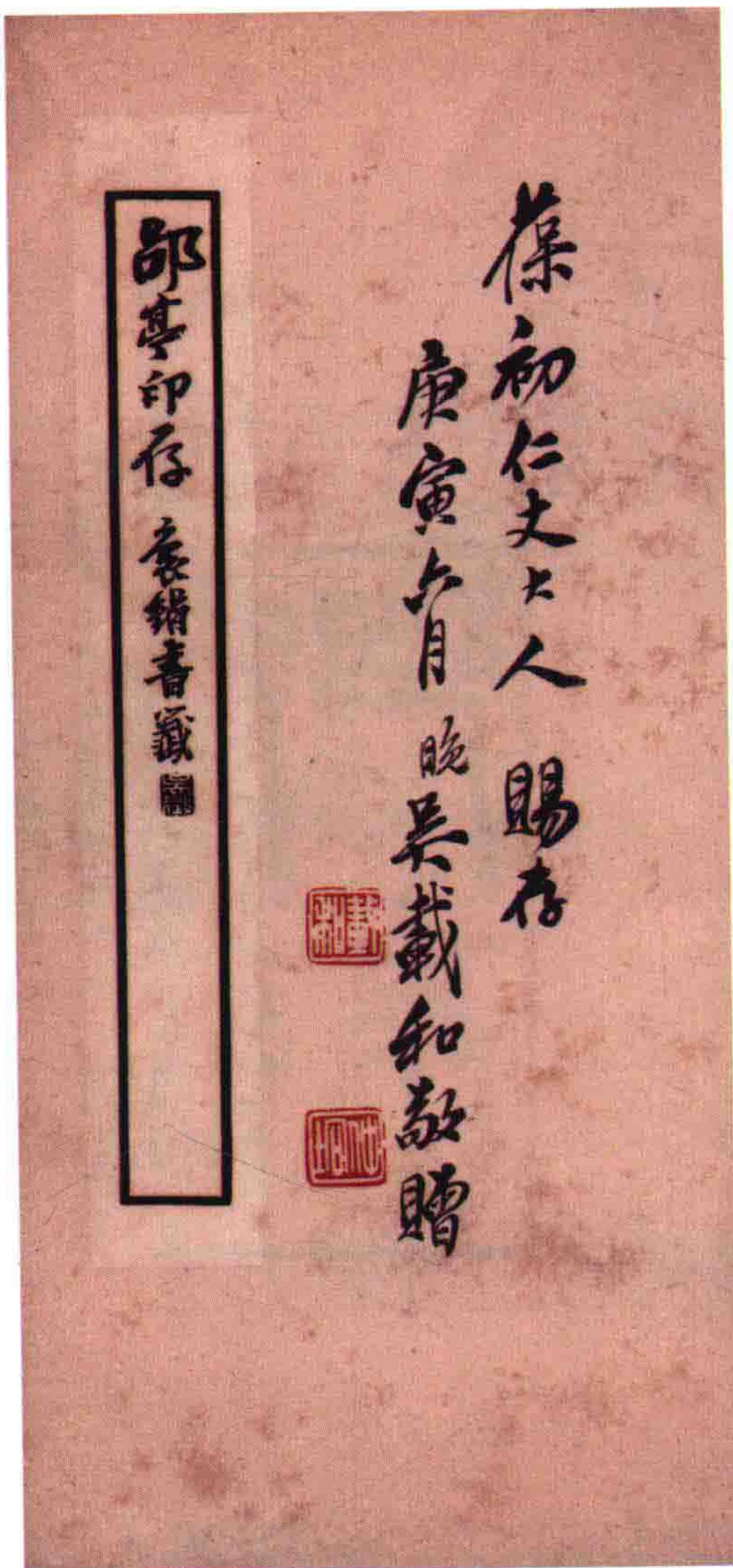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張劍
張燕嬰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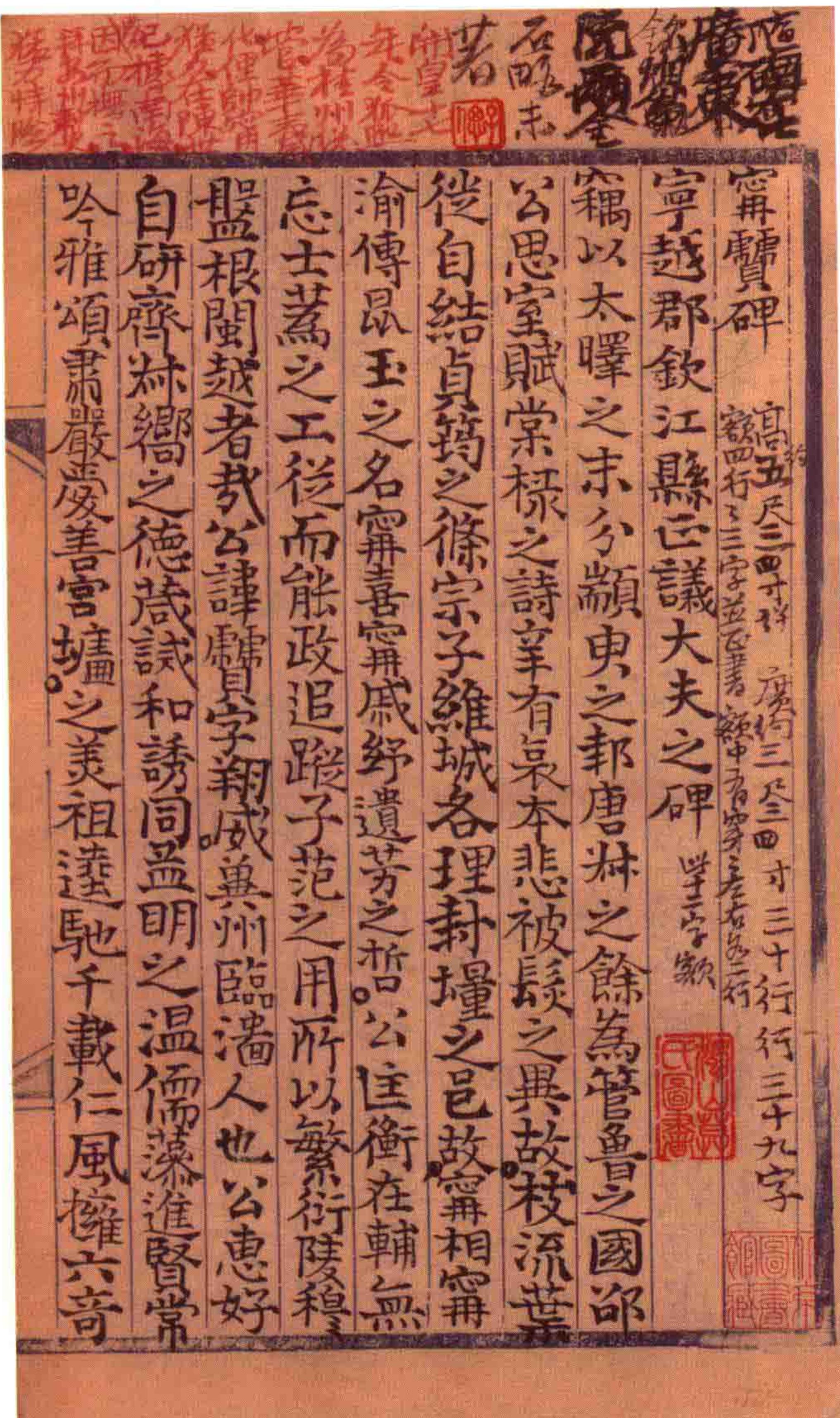
崇友芝全集

第十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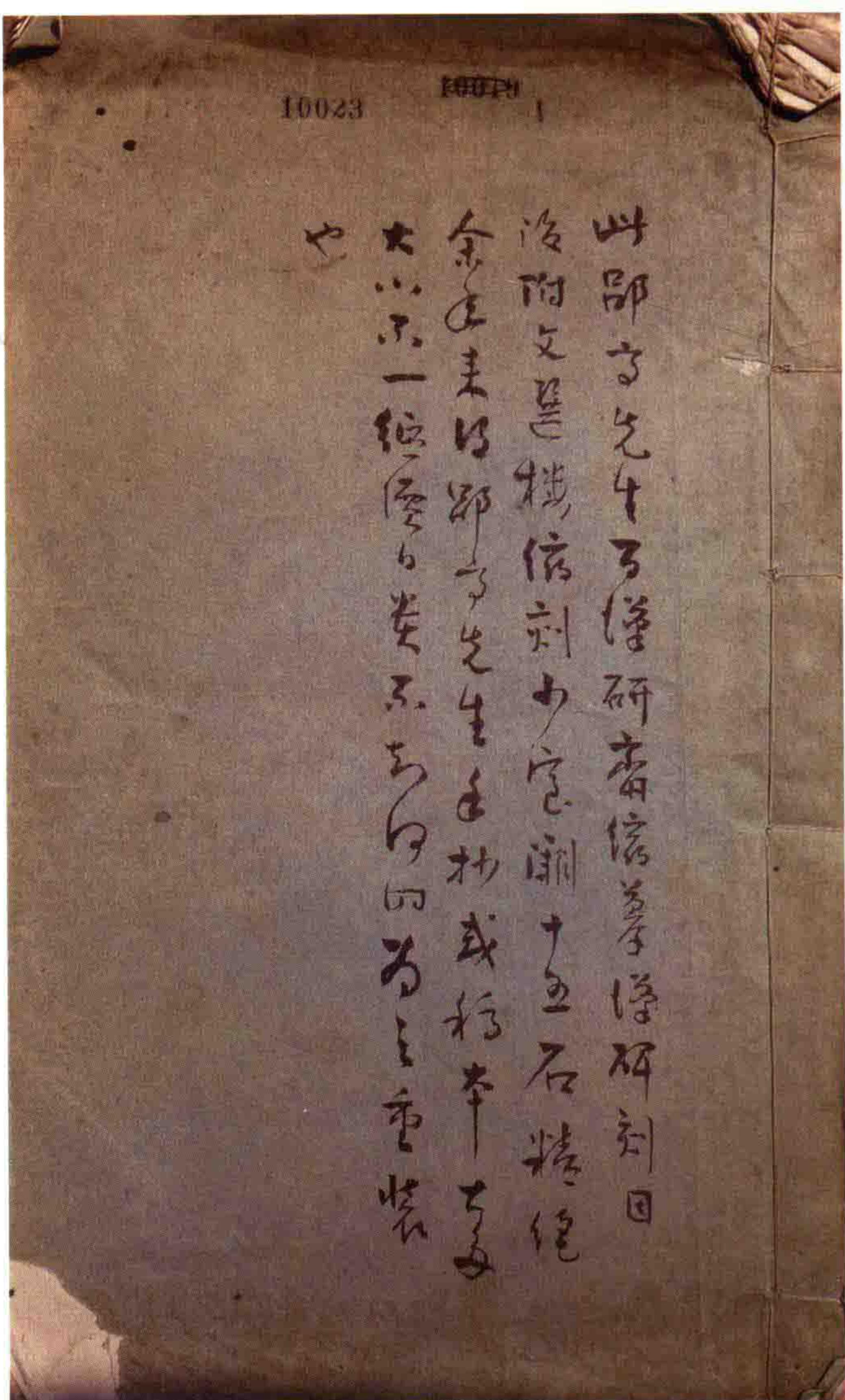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上海圖書館藏《邵亭印存》



國家圖書館藏《郎亭校碑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文選樓縮刻少室闕十五石》

邵亭行篋書目 但以書箱計號未盡分類

一號

十三經注疏一百冊 明閩刊本

爾雅正義邵晉涵四冊二十卷 乾隆戊申刊

孟子正義焦循里堂四冊三十卷 半九書壇刊

七經孟子攷文日本山井鼎三十二冊譏立物觀南遺洪二百卷

國家圖書館藏《邵亭行篋書目》

徵君莫子偲墓誌銘

武昌張裕釗撰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邵亭晚號眞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勦苗遂遷居都勦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強州學生皆以君考貴贈如其官考與傳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晝州道義府學教授會文正公奉其墓曾教授莫君者也教授君故名進士曰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効鷹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連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齰以許鄭之學

張裕釗撰邵亭墓誌

莫友芝

莫友芝

曾祖慕能

胞伯祖

胞伯祖

曾祖母吳氏

胞伯祖

胞伯祖

夭周

胞伯

胞伯祖

祖強邑庠生

胞伯祖

胞伯祖

祖母吳氏

胞伯祖

胞伯祖

夭張

胞伯

胞伯祖

夭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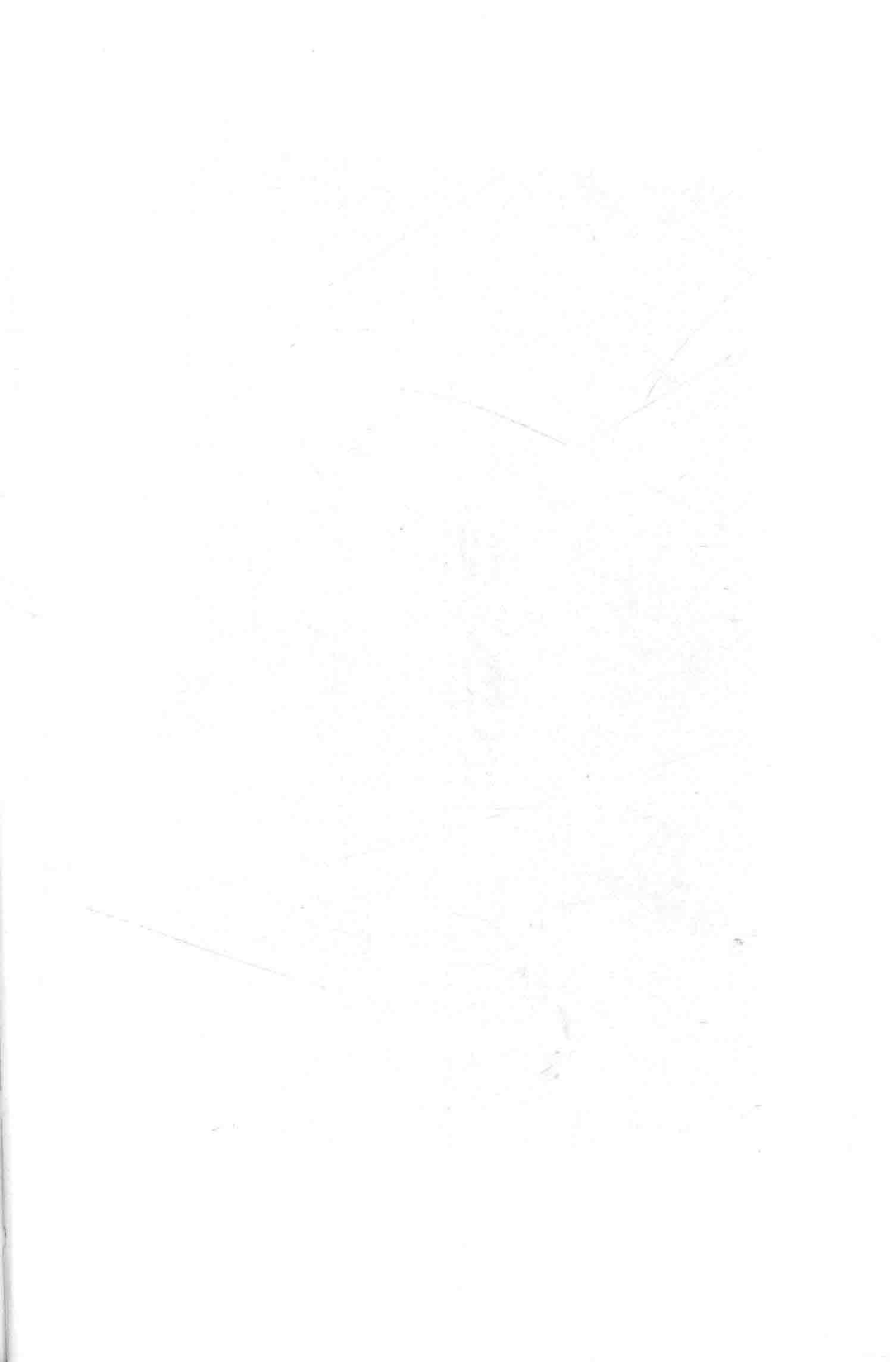
胞伯

胞伯祖

1943年
9436

贵州省博物館藏莫友芝鄉試硃卷

邵亭印存



目 錄

整理説明

邵亭印存

一五 五

整理說明（二）

《邵亭印存》是收錄莫友芝名號的印譜，係近人吳載和所輯。吳載和（一八九七—一九七一年），名仲堦，又字在和，別署仲珺、仲軍，江蘇揚州人，齋號有餐霞閣、山樓等，因受父執李尹桑（黃牧甫再傳弟子）啟蒙學篆刻，故又號「師李齋」。

據吳載和在譜後的跋文可知，一九三三年，吳於姑父莫經農（字伯衡、伯恒，莫友芝之孫）家獲見莫友芝自刻用印二十餘方，便乞之拓成此譜，以饗同好。吳的好友馬國權著

〔二〕本文由吳鵬先生撰寫，原題作「《邵亭印存》小考」，載《藝術品》二〇一四年第八期；今徵得吳先生同意，略予刪改，移作說明，並請吳先生對序跋及印章予以釋讀。另按：《邵亭印存》當係鈐印本，因鈐印時間和所處條件不同，故序跋與鈐印有多寡之分，各時期鈐印本所收之印順次也不盡一致。今所見者，似以貴州博物館藏本所收序跋最少而鈐印最多，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所收序跋為多而鈐印反少（僅二十三方，然有一方未見於貴州博物館藏本）。此次整理，序跋多取華東師範大學藏本，鈐印多取貴州博物館藏本，兼取上海圖書館藏本，而成此百衲本；每幅圖片下均注取自何本，以示所來有自。

《近代印人傳》，吳載和也列於其中，據該書「吳仲坰（載和）」條載，吳氏因感歎世人只知莫友芝善書，而不知其能治印，於是輯《郎亭印存》行世，當時篆刻名家趙叔孺、吳待秋、黃賓虹、王福庵、李尹桑、宣哲諸老曾為之序，咸稱有功印苑。

曾有人懷疑莫友芝能否治印，在宣哲的題詩中，也透露出這種信息，如云「或疑非出自眴叟手，摩挲乳石孰證之。……諦審書勢若畫一，舉隅反三庸何疑」，宣哲於此似為解疑。

其實在《郎亭印存》所收的三條邊款中，第二條有古文「莫五自作」之語，由此可知莫氏自能治印。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歐陽摩一在《莫友芝精品印章》一文中，記述自己曾覓得莫友芝「游方之外」朱文印一方，邊款為隸書「同治元年眴叟治印」，這也可以作為莫氏能為篆刻的佐證。筆者試圖在莫友芝的詩文信札中查找其關於治印的材料，然皆未果——也許正如王福庵先生在為《郎亭印存》所作序中云：「其刻印知之者少，此殆如右軍善畫，惟以書傳，太白工書，僅以詩顯者歟？」

作為貴州名賢，莫友芝遺澤多存本鄉，此《郎亭印存》雖非友芝自拓，却也見藏於貴州省博物館。其書頁版框和序跋文字均為石印，鈐印共二十八頁，其中三頁每頁鈐印二方，

其餘每頁鈐印一方，故全譜所收友芝自用印章實有三十一方（前三方印並附邊款三面，各占一頁）。此本與馬國權所言版本有所不同，只有三篇序言，作者分別是趙叔孺（時樞）、吳徵（待秋）和黃賓虹，書末有吳載和跋語。吳氏在跋中自言其輯此印譜時，距莫友芝去世已「逾一甲子矣」，落款時間為「癸酉十月」，癸酉即一九三三年，與馬國權所載也相符。然貴州省博物館原館長陳恒安先生則定此譜時代為「清同治十三年」，不知何據。按同治十三年即一八七四年，其時莫友芝才去世三年，而吳載和則是二十五年後才出生，故陳先生所定《郎亭印存》印行時間不確。

西泠印社也藏有《郎亭印存》，郁重今先生所輯《歷代印譜序跋彙編》錄有《郎亭印存》的七篇序文，作者分別是吳待秋、黃賓虹、李尹桑、王福庵、宣哲、陳廷韓和秦曼卿。扉頁為趙叔孺篆書「郎亭印存」四字書名，趙氏題識於四字之後，末錄吳載和的跋，此與貴博藏本相同，然所存序文竟逾貴博藏本一倍之多。國家圖書館所藏《郎亭印存》，與西泠本相類。香港林章松先生亦藏有《郎亭印存》，在林先生惠示筆者之資料中，其藏本之作序者列有趙叔孺、吳徵、黃賓虹、王福庵和宣哲五人，尾跋亦為吳載和所作，較西泠和國圖藏

本少，難道《邵亭印存》不止一版？而西泠和國圖藏本作序人最多，莫非就是《邵亭印存》最後印行的版本？俟詳考。

又，郁書所云「正頁鈐印，每頁一印……全本共二十八印」，則與貴州省博物館藏本之有三十一方印章有所不同。郁氏在題識中謂「一九三六年，吳載和輯集獨山莫友芝邵亭遺印」，此語不知所由，莫非是據譜中王福庵於丙子年（一九三六）所作序文推理而得？亦未可知。

《邵亭印存》今藏並不罕見，也常在拍賣會上現身，如中國嘉德二〇〇六年秋季拍賣會「碑帖法書」專場曾有拍賣，據其目錄介紹，此譜一九一八年鈐印本，收入常用印二十八方。因筆者未見原譜，故其所定印行時間一九一八年，無從查考；而所收印爲二十八方，則與郁重今所見之西泠藏本相符。其他如二〇〇九年天津國拍今古齋秋季古籍善本拍賣會、上海博古齋二〇一二年春季拍賣會等，也都曾拍賣過《邵亭印存》，然皆未對印譜的細節作具體描述，故難作論。

有清一代是碑學的鼎盛時期，故清人多能篆隸。晚清文人游幕風氣盛行，交游生活也較前代更加豐富多彩，筆墨應酬尤為常見。碑學風潮之下，文人書家們也慣於創作篆隸書法，這其實也是當時藝術社會的主流語境。一些書家在創作之餘，因應酬之急需，便嘗試自作篆刻——莫友芝正是此類典型。從莫氏現在所遺留的篆隸書法與篆刻作品來看，大率以漢為宗，篆書多取法漢碑篆蓋，楊守敬評曰：「子偲書學《少室碑》，取法甚高」，「嘗集漢碑頭篆刻百餘通，所作篆書多從此出。」《少室碑》即東漢篆書碑刻《嵩岳少室石闕銘》，楊氏奉之為「篆書科律」。友芝隸書則以《乙瑛碑》、《夏承碑》、《張遷碑》等漢隸名碑入法，並融有魏碑筆意，自謂「鄙意信碑不信帖」，足見其受當時尚碑風氣浸染之深。其篆隸技法老熟，格調高古，實為自家面目。在篆刻方面，其風格肇源漢印，間習元朱文，旁及明清印式，故其作品中，既可見古樸稚拙之趣，亦時有靈動巧化之功，入古出新，與同時印人相較，毫不遜色，在印史上當占一席之地；然而近代葉銘、馬國權等先生所編著的印人傳記中，竟未將其列入，實有遺珠之憾。